

# 木铎金声传古韵 守正创新续新篇

## ——山东博物馆打造特色讲解品牌

张玥 赵倩儒 李放

为进一步提升博物馆开放服务水平和质量，日前，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以规范和加强博物馆讲解工作。《意见》提出，要高度重视讲解服务工作，优化馆内讲解服务供给，规范引导社会讲解服务，不断拓展讲解服务形式等。

山东是文化旅游资源大省，山东博物馆一直把宣传教育功能放在重要位置。特别是在“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的升级改造过程中，山东博物馆始终把提高政治站位与展览工作站位相统一，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以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力求为发展文博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博物馆贡献。

### 阐释文化：讲好文物故事，传播齐鲁文脉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讲解工作搭建起博物馆与观众沟通的桥梁，是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提供公共服务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如何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值得博物馆人持续思考、关注和努力。

山东地区史前时期文化谱系完整、自成体系，文化发展水平极高，是中华文化多源之一，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历史时期，山东地区古国林立，并与周边交流融合，对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产生了积极作用，奠定了齐鲁文化的大传统。齐国的争霸称雄，文化扩展，是齐鲁文化交流融合的集大成者；鲁国对周礼传统的继承、传播，是礼崩乐坏、战乱时代的精神砥柱，是对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成为齐鲁文化重要特点的创造者。

阐释与弘扬齐鲁文化，是山东博物馆人的使命，通过藏品展现“山东六十多万年人类史、一万多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三千多年齐鲁文化史、一百多年奋斗史”是山东博物馆人应担负起的责任。“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以时间为序，以体现齐鲁文化突出特征、发展脉络的重要文物为锚点，深挖每件文物蕴藏的齐鲁文化基因和血脉。展览展出文物精品2000余件，创新展陈方式，通过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实现了展览信息的多样化传达。该展览展厅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展线1200余米，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将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的谱系中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娓娓



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常为观众讲解“海岱日新”展览

道来，全面展示了山东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与近现代奋斗历程。

### 形成品牌：打造讲解矩阵，服务观众为本

今年8月以来，山东博物馆定期组织博物馆馆长、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策展团队开展公益讲解活动。为提升学术研究能力，策展、陈列和宣讲水平，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开创“齐鲁文博讲堂”举办系列学术讲座，同时提升了博物馆讲解队伍业务能力，不断增加优质讲解服务供给。

#### 馆长讲解

山东博物馆设立“馆长讲解日”，每周二上午由山东博物馆馆长们轮流到展厅为广大观众讲解。馆长们重点围绕“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从山东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角度介绍山东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以及展览创新展现形式。“馆长讲解日”不仅仅是创新博物馆发展理念，更是升级博物馆与公众沟通平台的重要举措。

#### 专家、策展人讲解

每周的周三至周日由山东博物馆研究专家和策展人为观众进行实地讲解。专家和策展人从

自身研究领域出发，以专业的角度加强对展览的解读和价值诠释，带领更多观众走进展览策展幕后，了解更多展览背后的故事。

#### 专职讲解员讲解

山东博物馆以“学术立馆”为目标，建立起了以培育人才队伍为核心的工作机制，打造了一支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专职讲解员队伍，为观众提供涵盖所有常设和临时展览的线上线下讲解服务。讲解员队伍因人施讲，丰富了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先后获得“最美文化遗产讲解员”推介活动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讲解员、山东省金牌讲解员、山东省五好讲解员等荣誉。

#### 志愿者讲解

山东博物馆不断加强志愿者团队建设，规范志愿者管理，拥有一支热爱传统文化、甘于奉献的志愿者讲解团队。团队涵盖了老中青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的人群，他们从观众中来，到观众中去，为展览的宣传讲解提供了不同视角，注入了新鲜血液。

### 创新手段：把握分形叙事，科技助力观展

锐意创新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不竭动



志愿讲解员为观众讲解“珍宝”展

力。无论是讲解内容还是讲解形式，山东博物馆都秉持着以观众为本的理念，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不断提升优化，加大讲解内容研发和更新。

#### 叙事手段推陈出新

以山东博物馆“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为例，通史陈列主要展现地方历史文化特色，也是观众了解山东城市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窗口。在通史陈列的讲解中，首要的是给听众勾勒明确、清晰的地方历史轮廓，这是观众理解展览的基础。山东博物馆通史陈列的讲解，在内容上对宏观层面的地方史进行梳理，把握历史节奏尤其是本地文化在中华文明史各个时期的历史地位，提炼出本地历史文化的定位和地位，将其放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彰显山东对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通史展的讲解内容虽是讲历史，但并不是单纯的输出历史，而是有主线的线性叙事，在历史事件中海选出一条主线，再将各展项内容利用多条支线穿插其中。山东博物馆通史展的这种讲述结构既出于和策展意图一脉相承的释展需求，又出于以“讲好一个完整故事”为目标的追求。讲解内容不仅保留了线性叙事的经典讲述方式，同时根据主线内容的重要节点进行“设问”，以问题为起点形成多条线索进行“分形叙事”，从常规每个

## 海南省博物馆藏“灰陶鞞帽俑”琐谈

李娟娟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海南省博物馆推出原创展览“天涯觅珍——海南省博物馆征集成果展”，其中有1件元代灰陶鞞帽俑十分特别，是2008年从丹麦追索的流失文物。即使在今天，流失文物回归的每一次微小进展都是非常艰难的，此事件是当时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文物追回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曾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2012年11月7日，国家文物局将包括灰陶鞞帽俑在内的1213件(套)珍贵文物和标本，划拨给海南省博物馆收藏。即后，一场名为“陶瓷瑰宝——国家文物局划拨海南省博物馆入藏文物特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该件元代灰陶鞞帽俑也在当时的展出文物之列。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史称元世祖。元代火葬盛行，与汉族厚葬制度有着较大区别。元人《熊梦祥《析津志》曾写道：“候一二日即昇尸出，就檐下入棺。抬上丧车，即孝子扶辇，亲属友人挽送而去，至门外某寺中。孝子家眷止就寺中少坐，一从丧火烧竣……烧毕，或收骨而葬于累累之侧者不一。”《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也载：“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火焚之。”再加上当时盛行的秘葬制度，导致出土的元代文物数量相对其他朝代较少，但从质地和精美程度来看，文物中的陶俑人物五官精致、张弛有度、表现力强。目前元俑及元墓葬主要集中在我国北方，多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山东等地发现。

像灰陶鞞帽俑这种男俑形象，在蒙元随葬陶俑中不仅数量多且造型多，大致可分为出行仪仗和随侍供奉两类。海南省博物馆藏男俑胳膊上搭有长巾，应属于随侍供奉类。此外，还有部分随侍俑是手持伞、盆、壶、交椅、剑、杖等造型。该俑质地属灰陶，陶质坚硬细腻，灰黑中透亮光，未施釉彩但精工。元代陶俑以细腻灰黑陶为主，多不上釉，也有部分施彩绘情况，如西安小土门村元墓出土的笄袖女俑、执巾男俑等，河南焦作靳德茂官墓出土的随葬陶俑均施有彩绘。

根据此件灰陶鞞帽俑的帽式、服饰，简述笔者认识的三点认识：

一是此俑名为灰陶鞞帽俑。这里所说的“鞞帽”二字，应分开来解。“鞞”是古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鞞帽”意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戴的帽子，而非此帽名曰“鞞帽”，孙机先生在《介绍自丹麦回归的中国文物》中称此帽为“瓦楞帽”，方形瓦楞帽和锐笠帽均可泛称为鞞帽，都是元代流行的样式。

蒙元时期，帽冠在其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各阶层男女均戴帽冠。瓦楞帽虽为当时元代主要帽式之一，但从现在出土的文物数量上来说则极少，除海南省博物馆藏这件外，还有四件：在呼伦贝尔扎赉诺尔博物馆，有两件造型一致的牵马俑，据了解是从当地征集而来，具体出土地已无从考证；一件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是从刘元振



元代灰陶鞞帽俑局部

及夫人郝柔合葬墓中出土的牵鞍马俑组合；一件是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元代黑陶男俑。整体来看，海南省博物馆这件男俑神形兼备，制作精妙。不过这种式样的帽子在古今图像资料中多有展现，且士庶、主仆均有佩戴。在现代，1990年发行的“中华传统服饰”系列邮票第五组，就包括一张绘制着金元时期头戴瓦楞帽身着辨线袄的男性形象邮票。在古代，辽宁凌源官家屯元墓壁画中有正在演奏三弦者头戴瓦楞帽，蒲城县洞耳村元代壁画墓中“行别献西园”和“醉归乐舞图”中有头戴瓦楞帽的乐舞和侍从人物形象；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中主人及多位仆人均有戴瓦楞帽。元代刊本《事林广记》中的插图有两位官员正在对弈，二人头上的瓦楞帽均置于榻上，居左者的帽子由侍者托举，居右者的帽子搁于榻上。由此可见，元代官员和普通百姓都可戴瓦楞帽。

明代黄一正《事物纪原》中载：“瓦楞帽，楞音稜，结牛尾作。”可知瓦楞帽多用牛马尾编织而成。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载：“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说明元代帽顶的装饰是展示帽子主人等级差别之物。除帽顶外，帽带亦可辨别帽子之等级差别，《元史·舆服志》记载，皇帝用“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而庶民则无论帽顶还是帽带“不准用饰金玉”。

二是陶俑应是元代中期以后作品。这件元代灰陶鞞帽俑高30厘米、宽16厘米，身材高大威武，头戴帽、着长袍、手搭长巾、穿筒靴、两腿立于长方形踏板上，头部向右上方微微仰，双目似斜斜斜、嘴角似笑非笑。制作工艺上采用元代的模型结合技法，即先以模成型，然后再对人物进行深加工。该男俑面部圆润丰满，五官清秀，阔耳、杏眼、小口，不仅形体比例恰当、造型精巧，而且表情生动

传神，富有动态感，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

杨洁在《陕西地区蒙元陶俑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根据陕西地区自20世纪中叶以来出土的数千件蒙元陶俑研究，将元代陶俑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1294年之前）元俑陶制相对粗疏，造型比例不甚美观，使用贴塑法；中期（1295—1332）陶制相对精良，造型比例准确，样式固定，模塑组合技法熟练；晚期（1333—1368）随葬陶俑逐渐减少至消失。另，据孙机先生分析，此俑与陕西户县贺氏墓、宝鸡大修厂元墓等处所出文物颇为接近，时间上与中期基本一致。综上，不论是人物整体的塑造还是微表情的表现技巧，无疑都是元俑中少有的上乘佳作，应是成熟时期的作品。

三是服饰体现蒙汉交融的特色。灰陶鞞帽俑着右衽长袍，右衽和左衽，是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重要区分之一。从先秦时期孔子《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旧唐书·室韦传》：“富宜大冢，秦养而噉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人通以为服。被发左衽……”《隋唐·突厥传》：“穹庐毡帐，被发左衽……”中均可看出。根据史料记载和出土实物，蒙古族在一统中原之前，蒙古部落就开始主要身着右衽式服饰了。1237年《黑鞑事略》中记载：“其服右衽而方领……”1978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出土了一批蒙古汗国时期的丝织品，据考证，这是大蒙古国时期蒙古汪古部落的一处墓地，出土文物中就有一件织金锦袍为交领右衽，这些都是印证。此外，传世的元代历任帝王、帝后像，皆身着右衽式的蒙古族传统服饰。不过左衽式服饰，在元代仍在小范围内穿着，从陕西等地出土的元代女俑可看出。

到元英宗时期，建立起了元代的衣冠服饰制度，对各个阶层、行业服饰的搭配以材质和装饰做了统一，规定普通士卒的服饰材质以粗布为主，区别于蒙古早期以动物皮毛为主。另一方面百官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则规定了包括蒙古特色的质孙服等在内所有服饰从汉右衽。

《元史·舆服志一》：“士卒袍，制以绢絁，绘宝相花。窄袖袍，制以罗或絁。辨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辨线细折。……束带，红鞞双獬尾，黄金涂铜胯，余同腰带而狭小。”海南省博物馆馆藏这件元代灰陶鞞帽俑的服饰为腰间无细折而系短腰带，区别于当时十分流行的另一种服饰款式辨线袄，由此可知男俑身着的长袍应为窄袖袍。

元代服饰既有汉服中重要的右衽特点、材质特色，又包含了蒙古服饰的民族特色。同时在国家祭祀、议事等大型政治活动中，汉族和蒙古族两套服装独立存在，是汉蒙文化融合发展的具体体现。中国作为多民族地区，民族间的交流、创造、互学互鉴，共同谱写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构建多元且充满活力的社会。

## 上方山《四十二章经》

杨亦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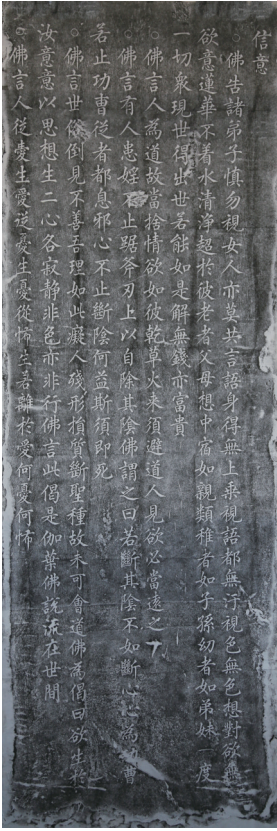
上方山位于北京房山区的韩村河镇，是北方著名的佛教圣地。素有九洞十二峰，七十二遗庵之胜。其佛教肇始之早，更冠于京师。《上方山志》记载其年代为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年）。抛开证据支撑不谈，这一颇覆中国佛教史的记载，足以令人讶异。由此推算1973年的建寺史且不必说，仅就其确证的历史亦有1488年。

上方山峰峰隐寺，寺寺藏宝。明万历四年（1576年），时任总督东厂官校办事提督两司房掌司礼监御用监印提督礼仪房太监的冯保施财修缮上方山云梯，同时还修缮了云梯庵、静夜堂，创建了永亨庵，并于上方山下的孤山口村创建了规模宏大的普济寺。

永亨庵在福德庵西，占地五六亩。已圯。背南面北，两进规模。一进正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二进正殿三间，背苍岭面青峰，古松成林，绿荫蔽日。庵前及庵东的平地甚广。据院内的明碑记载，永亨庵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施财创建者正是冯保。永亨庵落成后，奉《大藏经》一藏，计五千零四十八函，全部经函用蓝纸包裹，共安置八个经柜，分别藏于永亨庵正殿、两翼庵设的经柜中。可见，当年创建永亨庵，就是为了奉藏《大藏经》。“文革”时期，这部大藏经被送到北京国子监保藏，后来辗转流落房山区的云居寺。

普济寺在上方山以东的孤山口村，明万历四年（1576年），圆银和尚在冯保的资助下，创建了普济寺。因为圆银此前为上方山僧，居于上方山的东朝阳庵。所以，普济寺成为上方山属寺，踞于上方山七十二庵之列。普济寺落成后，圆银和尚以寺院所在地“孤山”为号，称孤山圆银和尚。普济寺居于孤山口村北，现已圯废，遗址仅存。三进规模，遗址前尚存巨大的夹杆石。每进正殿三间、左右配殿三间。

明万历五年（1577年），冯保又于上方山兜率寺主殿雕刻《佛说四十二章经》嵌于后壁。至今《佛说四十二章经》在上方山整整存留了446个春秋。《四十二章经》集结了佛陀



《佛说四十二章经》局部拓片

有关持戒、忍辱、断欲、精进、观空等事的42段语录，言简义丰，明了易懂，通摄大小乘一切教义，涵诸法要，为佛教弟子烛灯示径。此经堪称佛教诸经中的殊圣之典集，它伴随佛教的脚步，来到东土震旦。东汉永平十年（69年）的一天晚上，汉明帝梦到一位神仙，金色的身体像朝霞一样闪闪发光，身上有日光环绕，飘飘荡荡从远方飞来，降落在大殿前。汉明帝非常高兴。第二天上朝，他把自己梦到的梦告诉大臣，询问是何方神圣。太史傅毅博学多才，他告诉汉明帝：听说西方天竺有一位得道的神，号称佛，能够飞身于虚空，全身环绕着日光，君王您梦见的大概是佛。汉明帝对傅毅的话很感兴趣，于是便派使者羽林郎中秦景、蔡愔、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蔡愔和秦景跋山涉水，到达了天竺国。天竺国的人听到中国派来使者求佛经，表示欢迎。天竺有两位高僧提摩腾和竺法兰，帮助蔡愔和秦景得到了一些佛教的义理。三年后，不失信道西归，其中包涵的神圣和庄严又不必说。款署“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 乾清官管事 提督两司房 司礼监掌监事 兼掌御用监印太监 镇阳冯保沐手拜书”。兜率寺主殿书写的石刻《佛说四十二章经》，亦堪称明代书法艺术之珍品。《明史》记载冯保“工书法，善制琴”。上方山兜率寺《佛说四十二章经》令人有幸一睹这位明廷宦臣的书法真迹。

《佛说四十二章经》以其书法之精妙、佛经之珍奇，集中展示了上方山佛教的源远流长、佛教文化的丰富璀璨。

置身上方山兜率寺主殿后壁，映入眼帘的便是《佛说四十二章经》，经石十五条，自右而左，依次排列。字字写来，极尽端庄严整，又不失俊逸洒脱，其中包涵的神圣和庄严又不必说。款署“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 乾清官管事 提督两司房 司礼监掌监事 兼掌御用监印太监 镇阳冯保沐手拜书”。兜率寺主殿书写的石刻《佛说四十二章经》，亦堪称明代书法艺术之珍品。《明史》记载冯保“工书法，善制琴”。上方山兜率寺《佛说四十二章经》令人有幸一睹这位明廷宦臣的书法真迹。